

朱纪华 主编

外国记者眼中的 中国共产党人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Eyes of Foreign Correspondents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Eyes of Foreign Correspondents

朱纪华 主编
上海市档案馆 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 / 朱纪华主编. --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452-1651-6

I. ①外… II. ①朱…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1919~1949 IV. ①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0251号

本书由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资助

出品人 周皓
责任编辑 罗英
特邀编辑 邹伟农 徐耀萍
装帧设计 董春洁
技术编辑 李荀

书名 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
主编 朱纪华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网址 www.shp.cn
地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邮编200040)
印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1
字数 336,000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52-1651-6/J.1014
定价 98.0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电话:021-64366274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序

朱纪华

一

上海，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城市，自 1843 年开埠以来，她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每一步关键走向都紧密相联。风起云涌的近现代中国，赋予上海的，既有无尽的悲怆，也有无限的荣光。而细数这座城市的历史，或许没有哪一个事件，能如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成立，赋予这座城市更大的荣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荣历程，并最终创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

因此，上海这座城市的底色是红的，它构成了这座现代化城市独具魅力的红色记忆。上海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发源地，也是改革开放的先锋城。作为中国红色事业的源头与现代化进程的领航者，上海的发展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复兴的历程。

历史不可忘记。历史是一面镜子，是一扇窗户，可以给我们警醒，也为我们带来希望。温故而知新，只有认真检视历史，厘清民族崛起的脉络，我们才能更好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身为守护上海城市记忆的档案人，我们一直在探寻与开掘这座城市的珍贵史料，来再现中国革命的苦难辉煌。我们曾举办过各类富有意义的活动，并收获了良好的反响。但与此同时，方法创新的瓶颈也于我们越来越紧迫，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进一步独辟蹊径，让历史的再现更有新意、更有说服力。

再现历史，最真实的莫过于亲历者的记述，最客观的莫过于第三者的诉说。而记录历史的各类文本，最真实、客观、公正的又莫过于当时的档案及新闻报道。这种思考促成了我们一个崭新的构想，即借助作为历史见证者的外国记者的视角，通过对其档案与新闻作品的展示，来还原中国革命的史实。这种想法正好与一段历史完美对应，那便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外国记者远渡重洋，从上海这座沟通中西的城市进入中国，继而辗转西北，深入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进行采访。依托于上海繁荣的报业，他们将采访到的一些珍贵新闻，从上海传向世界。

无可忘却的历史，无可取代的上海，无可辩驳的第三人称叙事，催生了一

场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主题历史档案展。通过一年时间的精心策划以及广泛收集国内外档案，我们选定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外国记者，以他们当年采访中共革命时留下的300多件世所罕见的档案、图书、照片及视频为展品，最终完成设计。2012年9月，作为上海迎接党的“十八大”一项内容，该展览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这一展览开创了档案展览空前的传播效应。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等上海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市老领导集体莅临参观、指导，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新社等众多中央媒体及地方媒体刊发专文予以报道。其独特的传播价值受到了各方的肯定和欢迎，如同一位耀眼的明星，她不断地接到邀请，陆续在北京、宁夏、甘肃、湖北、陕西、福建等地进行巡回展出。2014年，该展还被请入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成为该校的一项常设展览，并在那里落定终身。

这无疑是一个极为成功的展览。可是我们深知，展览虽然具有视听审美优势与明显的现场感，但是对特定主题的深度呈现却有所缺憾，而且其空间传播也会受到制约。于是，基于同样的主题诉求和突破这些不足的目的，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出版一本以外国记者视角见证中共革命历史的图书，便显得必要而迫切。因此，上海市档案局（馆）联手《城市导报》组织了一支编写团队，经过精心策划、努力挖掘与认真编撰，本书《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成功付梓。

二

随着本书的时空指向，我们将目光投向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西北。那里是中国红色革命的“圣城”——延安，辽阔而贫瘠的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正与人民群众一起，进行着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他们斗志昂扬，对未来充满必胜的希望。

但是，由于国民党“石堡般严密的新闻封锁”，此时的延安却犹如白色海洋中的一个红色孤岛，与世隔绝。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只是被极端丑化的形象。

1936年，埃德加·斯诺抱着“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一定要去的决心，冒险来到陕北苏区，想对这里探个究竟。作为第一个叩开延安大门的外国记者，他采访到了“一生中在亚洲所能得到的最大的独家新闻”，于是兴奋而迫切地向世界报道了这里的真相。

这是一种莫大的感召，在斯诺的身后，其他外国记者接踵而至。本来，这些外国记者的政见与我们不尽相同，但基于笃信“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他们客观公正地记录了红色延安这个没有乞丐、没有卖淫、没有贪污和苛捐杂税的理想社会，这是“一个中国人的新世界……充满光明与活力的地方”。当爱泼斯坦将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告诉家人时，他的感受基本上代表了这些外国记者的共同心声：“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

这些外国记者公正的对外报道，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来说，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们突破了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使世界终于有机会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全民族抗战，为这场革命争取到了广泛的国内外舆论支持。在看到这些记者的文字后，国统区许多进步青年受到影响，奔赴延安投身革命。1944年，在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进入延安进行采访后，毛泽东在一篇社论里写到：“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看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现在，果然亮起来了！”

此时的延安，已在孕育着一个新中国。今天，透过这些记者的文字、照片和视频，我们再次清晰地看到了那场艰苦卓绝而又光荣正义的中国革命。它源起于苦难深重，爆发于民不聊生，是一个民族在历经各种尝试都无法救亡图存时，她的人民必然选择的一条路径。

三

这种表达，正是本书《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自然流露的重大主题。本书以外国记者的视角，再现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也记述了这些外国记者的光辉人生。因此，本书所呈现的不仅是一段中国革命史，也是一段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历史。在这份别具一格的文化作品中，我们所绘就的，乃是一幅生动饱满的，而不是“碎片化”的历史图景。

一个灵动的创意，一项影响深远的展览，一本精华荟萃的图书，这一系列文化作品的成功，不能不说是上海市档案局（馆）在档案文化传播工作中的一个经典范例。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以各种方式和载体将人类的历史活动过程和思想认识成果记录下来，并使之流传后世。挖掘档案所具有的深厚文化价值，将档案工作从传统的保管、利用等基本职能扩展为同步实现文化传播功能，是档案事业在新形势下实现发展转型的重要路径。“红星照耀中国”系列

文化作品的开发就是对这种路径的大胆尝试，她以绝佳的效果为我们呈现了档案文化传播在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大有可为的功用。

作为上海档案事业“十二五”规划“三大重点工程”之一，档案文化传播在近几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通过开展各类具有强劲而广泛影响力的大型文化传播项目，我们实现了档案文化传播从“碎片化”到“系列化”的快速转变。

这种“系列化”，既包括我们对有一定规模的档案文化传播项目的接连推出，也包括我们在每一个项目开发中做深、做透、做精的持续努力。前者如这几年陆续赴国外举办了“泰戈尔的中国之旅”“路易·艾黎在中国”“上海的德国记忆”“肖像上海”“印象上海”等档案展览，以及近年在国际档案日前后都整月开展了“上海市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等，这些活动频次高、效果好，受到各方好评。后者可以本书为例。作为以外国记者视角真实再现一段中国革命史的历史档案类图书，本书将一批外国记者前往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采访的相关档案史料进行深度挖掘，以系列文章的方式展现给读者，同时让读者从中感悟这批外国记者为真实报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浴血奋战的事实所加倍付出的艰辛和心血。本书集史料性、教育性、故事性于一体，不仅旨在缅怀这些记者恪守真实的新闻实践的职业操守，更在于颂扬永远与人民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使命、责任与担当，历史必将永远记住他们。

在这里，我们向所有为这项工作付出刻苦努力及抱有极大热情的同志和朋友诚挚地表示感谢。在这场奇妙的时空之旅中，我们忘不了国家档案局领导的重视支持和悉心指导，忘不了上海档案人海外征集的忙碌身影，忘不了国内外档案同仁的倾力支持，忘不了媒体朋友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偏爱。

我们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当下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号角雄浑有力，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正全面推进。我们的祖国，在那颗永远照耀的红星下，她的未来必将更加光明，更加灿烂，更加美好。

（作者系上海市档案局局长、上海市档案馆馆长）

目录

序	朱纪华
002 埃德加·斯诺： 第一个采访红色中国的西方新闻记者	张新
026 海伦·福斯特·斯诺： 站在斯诺身边的女人	吴臻
050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燃起一支追求真理的明烛	王永娟
078 “谁，什么是中国共产党？”： 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	吴臻
106 詹姆斯·贝特兰： 亲历西安事变，为世界带来“真实的声音”	王佳妮
128 冈瑟·斯坦因： 和毛泽东畅谈12小时的“第一记者”	陈晓琪
154 哈里森·福尔曼： 共产党在中国创造了奇迹	何佳玺

178	杰克·贝尔登： 坚信“共产党人必胜”	何佳玺
196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从国际主义到爱国主义	王永娟
222	沃尔特·博斯哈德： 第一个访问延安并见到毛泽东的欧洲记者	王佳妮
242	汉斯·希伯： 第一个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的外国记者	王永娟
262	罗曼·卡尔曼： 苏联著名摄影师用运动镜头“描述”红色政权	陈晓琪
280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 访问八路军的第一位外国军官	王佳妮
300	美军观察组： 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最高层接触的 美国官方组织的延安之行	方华

后记

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Eyes of Foreign Correspondents

朱纪华 主编
上海市档案馆 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Edgar Snow

埃德加·斯诺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年—1972年），美国新闻记者、作家。

1905年7月11日	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
1926年	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
1928年9月	抵达中国后，担任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
1932年	与海伦·斯诺结婚。
1934年—1937年	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
1936年6月—10月	经宋庆龄介绍，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访问陕甘宁边区并采访了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成为第一个采访边区的西方记者。
1937年10月	《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
1938年2月	《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抗战爆发后，离开北平，先后在西安、上海、香港、武汉、重庆、成都等地从事新闻工作。
1941年2月	因报道皖南事变而被国民党当局取缔记者特权，被迫离华。此后，先后在俄罗斯及西欧从事战地报道。
1949年	与海伦·斯诺离婚，后与洛伊斯·惠勒结婚。
1959年	移居瑞士日内瓦。
1960年	以作家身份访华。
1964年、1970年	又两次访华。
1972年2月15日	病逝于瑞士日内瓦。

埃德加·斯诺： 第一个采访红色中国的西方新闻记者

文 / 张新



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中国，日本侵略的阴霾笼罩神州大地。历经艰难险阻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人，向全体中国人发出了民族总动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抗战的呼喊。也正是在此时，一位外国人深入到中国西北荒凉的黄土高原，经过4个月的采访，用他的笔、用他的相机，将“神秘”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苏区展现在世界面前。他就是被誉为“给了世界第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眼睛”的美国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

带着无数疑问走向红区

埃德加·斯诺于1905年7月11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早年的斯诺在密苏里大学修习新闻学，但在毕业前便移居纽约。1928年，斯诺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同年7月6日，他来到上海，并且止住了旅行的脚步，在这个神奇的国度一待就是13年，直到1941年。斯诺到上海后，很快就在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校友鲍威尔任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找到了编辑兼记者的工作。《密勒氏评论报》持论公允，在上海的欧美人士中有很强的影响力。到职不久，斯诺就受报社派遣乘火车沿铁路干线进行旅行采访。

1930年至1933年，斯诺担任美国“统一新闻协会”驻远东记者、驻北平（今北京）代表，在中国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及东北地区和日本、越南、缅甸、印度等国采写旅行通讯及评论。斯诺先后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采访文章。

初到中国，斯诺和许多在华的外国人一样，是蒋介石的崇拜者。在他眼里，蒋介石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然而，当他在采访中走遍中国，看到军阀混战、饿殍遍地的中原大地，看到日寇侵略阴霾下的东三省，看到贪污腐化的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他失望了。1932年1月23日，斯诺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了《在中国洪灾之后》（In the Wake of China's Flood）的文章，以记者特有的冷静的笔调，向读者叙述了

1931年开始，斯诺与宋庆龄、鲁迅等人相继交往，他经常前往位于莫利哀路（今香山路）29号的孙中山旧居向宋庆龄求教。受宋庆龄的影响，斯诺对中国革命有了更深的了解



1931年8月的武汉大水灾，1200万户家庭毁于洪水，5500万人受灾。文章充满着对无助百姓的同情，也充斥着对残酷现实的悲哀。他看到上海的工厂里，小小的男女童工一天坐在那里或站在那里要干十二三小时的活。他看到缫丝厂的小姑娘和棉纺厂里脸色苍白的年轻妇女，她们卖身为奴，未经许可不得擅离门警森严、高墙厚壁的工厂。他还看到，1935年的上海，街头和河浜里收敛的死尸有29000具，这都是赤贫的穷人的尸体。这是什么样的社会？这样的政府、这样的领导人，真的能够挽救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中国吗？

也是在此时，斯诺在上海结识了宋庆龄、著名的左派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以及同情中国劳苦大众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人，从他们那儿，斯诺得知在中国的崇山峻岭中，还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正在为实现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人的梦想而奋斗着。1933年，斯诺与新婚不久的妻子移居北平，在燕京大学教授新闻学，当时斯诺正准备出版他的《远东前线》（Far East Front），偶尔也兼职为美国媒体写些文章。在北平，更为切身地感受到日本侵略的威胁，斯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斯诺夫妇在燕大图书馆阅读了许多有关时事政治的书籍，并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很快，夫妇俩都成为了爱国学生运动的同情者，并与一二九运动领袖们成为朋友。有史料披露，当时斯诺的家经常成为学生运动领袖们开会的地方。

与此同时，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也已得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举起了全民抗战的旗帜。为了加深外界对红军的了解，中共中央希望有一名公正的外国记者能去苏区采访，斯诺被选中了。

当时的斯诺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的了解还很不够，他的心中存在着许多的疑问。他写道：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并服从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

红军战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人是谁？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

共产党员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



斯诺在陕北的留影

红军的兵力有多少？他们的武器弹药从哪里来？它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它的士气怎么样？官兵生活真的一样吗？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一旦成功，这种巨大变化对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会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带着许多对中国革命、对红军的不解与问题，斯诺带着两架照相机、24个胶卷，于1936年6月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走向荒凉的西北高坡，进入陕甘宁边区，去寻找那些被通缉的，当时还被有些人叫做“土匪”的红军战士，成为在红色区域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

斯诺笔下的中共领袖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斯诺造访十分重视，被称为“红色牧师”的董健吾与斯诺接头。曾任苏区保卫局领导人的邓发亲自与斯诺见面，联络相关事宜。在苏区，斯诺首先见到的中共领袖是周恩来，在他的笔下，周恩来“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黑又长，但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些缓慢，但相当准确”。这位中共领袖的办公处“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着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而正是这位具有“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的中共领袖，亲手替斯诺起草了在苏区的92天的行程，使他能够深入了解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最后，斯诺在苏区所花的时间比周恩来建议的还要长得多，以至于他舍不得离开，因为他看到的太少了。

根据周恩来规划的行程，斯诺首先到达了当时苏区的首府保安（今志丹县），并见到了毛泽东。在斯诺的第一印象中，毛



1936年7月9日，斯诺（左一）在陕北安塞白家坪，见到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右二）

1936年8月,斯诺(右一)在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采访参加长征的老革命徐特立(左一),由黄华(左二)翻译、王林(右二)陪同



泽东“是个面容消瘦、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一头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随后几天，斯诺看到这位南京政府用25万悬赏他首级的中共领袖，在街上“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毫不介意地和身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在保安，斯诺和毛泽东谈了许多个晚上，光谈话笔记就有大约两万字。斯诺还从士兵和其他共产党员那里听到关于毛泽东的许多故事。他记录下了毛泽东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他怎样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的一个领袖，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是怎样成长壮大起来……在斯诺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中，毛泽东无疑是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位。在他笔下，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这位农民的儿子“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尽管偏处中国西北一隅，但毛泽东“对于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他熟读世界历史，对英国工党、美国罗斯福总统很感兴趣，还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在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

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斯诺不仅了解了他的传奇般的个人经历，更从他那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以及对抗击日



1938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珞珈山会见了斯诺